

转译便直接使用 secular 一词。^① 即便如此,它在波斯语与欧洲语言中的意义也可能无法完全等同。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使用日语来讨论世界各地的世俗化现象、讨论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从日语的角度观察过去与现在的世界。一边是我们对历史和当下的理解,另一边是其他英语研究者的世界图景,两者是否完全一样?对此,我们不能,也不应简单地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或许可以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随着世界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日益重要,上述问题也愈加突出。

但是,能不能极端地认为,由于不同语系有着不同的外延和思维模式,它们之间绝无可能达成相互的理解?我认为不是的。即使讲不同语言,我们也应尽力相互沟通,对过去与当代的世界形成共同认识,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只有进一步改善英语这一公认的国际学术语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语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当代英语仍然处在 19 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近代欧洲价值体系之中,正如阿萨德已经敏锐指出的,英语仍然是英语国家人们的语言,还不是一门国际语言。另一方面,包括日语在内的许多非欧洲语言,在理解、吸收、内化了欧洲近代知识体系之后,也建立了自身新的认知体系。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当近代知识体系的真实性和普适性开始动摇,只有以平等的立场对待世界各种语言的诉求变得日益迫切时,非西方语言才具备了比西方语言更为丰富多样的内涵。

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把在非欧洲语言中讨论的对象注入到英语中,借此建立起新的知识体系。当然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欧洲语言和非欧洲语言对应着不同的认知结构。但如果考虑到近代知识体系也曾极大地影响和改造了“非欧洲”世界,这一理想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有当英语发展到足以容纳非欧洲语境下的外来信息,并且不再局限于本身的单一背景展开讨论的时候,英语才真正成为一门国际语言。

(李春园 译,杨琴 校)

“脱亚入欧”的虚与实 ——对日本前近代社会的断想

周振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日本的前近代社会或许可以从室町幕府的灭亡算起。与中国不同,英雄辈出并不是日本古代史的特征,但从室町幕府末期开始的战国时代却接连出了六个大“英雄”,其中的后三雄,即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相继创立了安土、桃山与江户时代。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曾戏拟此三人为周世宗柴荣、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安土、桃山时代虽短,但所制订的一些关键性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江户时代所延用,并且改订得更为完善,从而形成了一个长达 250 年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为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转型创造了历史的基础。由于日本紧邻中国,不但早就从中国接受了汉字文化与佛教文化,而且公元 7 世纪大化改新的核心内容是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从而使日本进入一个律令制时代。这就容易使人误会,以为日本的社会形态与中国相类似,一直要到

^① Abdolkarim Soroush 等:《传统与世俗主义》(Sonnat va Sekularism),德黑兰,2002 年。感谢阿部尚史先生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

明治维新以后才摆脱中国这个老师的影响,而迈入与中国传统社会完全相异的欧洲道路。其实这种看法正与事实相悖,深入理解日本的前近代社会就会发现,日本无需脱亚早已入欧,或者换句话说,日本人欧早在江户时代初,而完全脱亚则在明治维新后。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脱亚入欧”,不但说明他对19世纪后期欧洲的进步表示钦佩,也表示他对于亚洲落后的绝望。这个口号表明,虽然日本地理上属于亚洲,但心中向往的却是欧洲。在福泽提出脱亚论一百年后,日本完全实现了入欧的梦想,成为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之一,而且是其中经济实力位居第二的成员。福泽的理想可以说是完全实现,今天日本之万元大钞,印上他的头像,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么福泽谕吉的愿望就那么轻易地实现了吗?日本明明地处东方,可是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却被很自然地看成属于西方,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其他奥妙呢?其实这个奥妙是有的,那就是日本在前近代时期,其文明形态就偏向于欧洲,而不与亚洲的大多数国家相同,更与作为汉字文化圈核心的中国有根本的不同,与同为此文化圈的朝鲜、越南也不同。许多人的错觉,包括一些日本人在内,总以为在明治维新以前,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的整个上层建筑,从制度到文字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怎么可能不像中国而像欧洲呢。尤其是在江户时期,德川幕府处处模仿中国,汉学极其发达,对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亦步亦趋,怎么可能不是中国式的文明形态而偏向于欧洲呢?如果说到底,这其实正是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我过去曾有文章比喻日本将外来文化当衣服穿,即使是对中国文化的貌似全盘的接受也是如此,只是表面的皮毛的接受。其实在日本,其政治制度与经济基础在安土、桃山时代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与欧洲实质一样的封建制,在江户时代前期,这种封建制完全定型,在政治方面这种制度可以称为幕藩体制,确定这一体制的法律条文是《武家诸法度》,与中国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称中国前近代为封建社会只是一种误译,此处不赘)完全是两码事。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土地制度上则是领主土地所有制,与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根本不同。所以日本在前近代时期就形成一种身子在欧洲而脑子在亚洲的奇异现象。或者说,就是一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完全匹配,甚至是完全不匹配的文明形态。

对于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相似之处,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是相一致的。在土地制度方面,日本学者北岛正元认为“十六世纪以后的日本,废除了以前居于土地所有体系之顶点的都市贵族的土地所有……,使土地所有形态变成一元化的领主的土地所有”。而这种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说的西欧中世纪领主“已经硬化了的私有财产”的领地,在形态上是近似的。江户初期所规定的《禁止田地永久买卖法令》与稍后的《分地制限令》就是形成这种“硬化”领地的法律保证。而在商业领域,美国学者 Rhoads Murphey 则以为,日本疆域较小,人口较少,而且中央权力较弱,因此容易发展出一个相对较强的全国性的国家商业体系,以及较强的并且半独立性质的商人集团,这一点与中国大不相同,而且日本的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也显然超过中国,而与欧洲近似。

其实就是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日本的城郭与城下町也与欧洲 castle 与 downtown 的对立比较相似,而与中国城市的围墙式结构完全不同。同时在技艺上、经济上以及在教养文化方面,虽然还带有封建的标识,但江户时期的日本在许多方面都与同时正在出现的欧洲的民族国家相类似。尽管江户时期也有类似中国的抑商措施,但实际上,由于各地的大名要履行参觐交代制度所规定的义务,经常负债累累,不得不向商人贷款,甚至与之联姻,致使商人在客观上的地位较高,与欧洲相似而与中国不同。

与不流动的土地领主所有制相匹配的是严格的身份制,日本表面学习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的分等制,但在中国这种身份并不硬化,而是可以垂直流动的,尤其通过科举考试由农而士是常见现象。经济上土地的流动,所谓田无常主,富不过三代;身份上地位的变动,所谓朝为种田郎,暮登天子堂,使中国的前近代社会至少维持了千年之久,而未发生根本性的变迁。而日本的根本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则使日本的封建时期相对稳定了两个多世纪,一直到明治时期向近代资本主义制

度的自然转变。所以日本前近代社会本来就是与欧洲封建形态相对一致的封建社会,日本学者将feudality译为封建制度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他们这样翻译的由头是因为幕藩体制的形态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封建形态很相像,尽管有实质的不同。但这一译语却是歪打正着,因为日本与欧洲的封建形态在实质上其实也相近的。

但与这样的经济制度不匹配的是,日本的上层建筑是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移植。江户时期的汉化程度很高,德川幕府的几代将军都醉心于中国文化,甚至行事都以中国古人为典范。作为德川将军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第三代藩主德川光圀,是一个《史记》迷,模仿伯夷、叔齐的行为,将藩主的位置传给其侄儿而不是自己的子息,就是一个显例。我参观过水户藩家族的墓地,注意到其中所有的坟头都一色朝西,显然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崇敬。对于中国的儒学,日本自古以来就表示出高度的仰慕,但在室町时代以前,儒学的权威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从江户时期的藤原惺窝起,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藤原等江户时期的汉学家多直接服务于德川幕府。藤原惺窝本人的学术虽以朱子学为主,但也吸收陆象山与王阳明之说,甚至还不脱佛学的影响。藤原之后的林罗山则是更有名的大儒,连续为四位幕府将军服务,其子若孙继承家学,相继担任儒官,从林凤冈开始世代被任为大学头,掌管幕府学事。朱子学之外,阳明学在日本也一样有坚定的传人,说明中土学术对日本影响之深。江户时期的汉学家,数量多、水平高,在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例如考据方面山井鼎与荻生观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就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赞扬,甚而进入四库全书总目中。而且即使是以西方知识见长,熟谙荷兰语的兰学家,也一般都先是汉学家,而后才兼治兰学。所以他们对荷兰输入的新词都能以典雅的汉文来对译,例如将电池的两极译为积极与消极,至今还为中国人所采用,只不过转变了意思。上层的汉学家甚至可以自如地用汉文写作,而鄙称日文为倭文俚语。林罗山之子林鷲峰,记其编纂日本国史经过的《国史馆目录》,就是用纯粹的汉语文言写成的。汉学在江户日本的兴盛一直维持到幕末,即使是福泽谕吉本人,也是汉学水平不错的士人,尤其娴熟于《春秋左氏传》一书。

尽管江户幕府醉心于中国文化,但那只是停留在对高深的儒家文化的仰慕,而不是对中国所有现成制度的照搬,例如日本从未考虑采取中国的科举制,因为日本并不希望出现身份的阶层流动,也因此日本儒学者的著作究其实与乡下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町人,即城里人也没有太大关系,虽然儒家著作都是在城市里刊印的,尤其前近代的大阪是一个极重要的汉籍印刷出版中心。所以从形态上看,上层(或表层)的儒家文化与底层(或深层)的町人文化保持表面的和谐是日本江户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对中国文化的深究虽然只属于上层士人,但附庸风雅却可以下达谄谀之无的普通人。于是江户后期,汉学就有了地方化、庶民化的倾向,以致在庶民中也出现了儒学者,甚至稍有点知识的人,就争相以写汉文、做汉诗相炫耀。甚至就是讲笑话,也要加上典故。这种风气一直要延续到明治时代的前期,甚至直到中日甲午之战前夕。

江户幕府是真情地倾心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但这种倾心也并不是单纯的追求时髦,而是有其实用的目的的。江户时期的幕府与各地大名的关系只是封建式的关系,幕府并不能直接管辖诸大名的领地,大名只要履行参觐交代以及进贡的义务,就是自己领地上的主人。而且根据与幕府将军的亲疏关系以及与幕府所在地江户的地缘远近关系,诸大名有亲藩大名、谱代大名与外样大名之别,许多外样大名更是趁着山高皇帝远,对幕府存有二心,幕末明治之际,倒幕运动的发起与四个著名的外藩,即萨摩藩、长州藩、肥前藩与土佐藩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江户幕府必然需要思想武器来对付存有二心的大名,这一武器最合适的莫过于儒家学说,尤其是朱子学。尽管朱子学是中央集权制度下产生的思想体系,而日本并非中央集权制国家,可是一样可以为幕府所利用,强调对君主的效忠被转用于大名对将军的输诚。而事实证明,这一提倡是有效的。许多大名竞相以对汉学的熟悉程度比高低,而幕府也收到加强相对集权之效。以至于在挟关原战役与大阪之役胜利

之威后,江户幕府所制定的《武家诸法度》能保证得到很好的实施。幕府甚至有力量可以对大名实行更封(迁移到另外的封地上去)以及削减部分的领地,虽然这种权力与中央集权制下的皇权不能相比,却与中国西汉初年的中央集权制下的封建制有点相似,颇有点处于封建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状态了。

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例如土地已经开始变相买卖,商人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大,与庶民关系不大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慢慢不吃香了,而到了幕末,与欧洲文明率先接触的萨摩藩等外样大名,首先扯出王政复古的旗号,目的却是要以欧洲的文明为模式来改造日本,脱离幕府的压迫,他们已经看到了欧洲文明优越于中国文明的地方。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学习欧洲渐渐蔚为风气,因此福泽谕吉适时地提出了“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唯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福泽的脱亚的这个“亚”其实指的只是中国与朝鲜,也就是脱离落后的中国与朝鲜的影响,而且最重要的即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那么脱亚之后去向何方呢?福泽断然而言:“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脱亚之后即是入欧,虽然福泽通篇文章没有“入欧”两字,意思却是明白的,所以后人总结其思想为“脱亚入欧”的口号。

有趣的是,福泽这篇语气严厉的文章却是不署名的方式作为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的社论发表的(该文原来甚至也没有标题,《脱亚论》乃后人编辑福泽著作时所加)。此时去江户幕府的大政奉还已经十七年,下距甲午中日战争只有九年,日本国力已经大有长进,“入欧”已经由表及里,何以福泽还有点遮遮掩掩之态?原因恐怕还在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担心脱亚论一时还不能被广泛接受的缘故。甚至就是向西方学习而言,中国人一开始也走在日本前面,就连福泽本人学习英语也是通过中国人于咸丰年间所编的《华英通语》而开其端的(后来他将该书加上假名注音而重新出版,作为民众的英语启蒙读物)。上面也已经说到,汉学在江户时代后期有庶民化的倾向,而即使明治维新后,欧风已经东渐,许多人仍以懂汉文、做汉诗为时髦,如身为贵族的大河内辉声在明治初年还特意拜中国士人王漆园为师学汉文(更有意思的是,1943年日本留学德国的著名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在其回忆一生的《怀旧录》里,也还竟然不搬弄洋文以显示其水平,而是留下许多汉诗,以表明其修养)。甚至到甲午战争临近时,日本许多普通百姓还觉得政府必定是出了问题,否则怎么能跟中国开战呢?而这种状态正是福泽忧心之所在,也是脱亚论出炉之推力。未曾想,中国海陆军一触即溃,从此中国在日本的威信一落千丈,即普通百姓亦看不起大清帝国了。脱亚论收到了明显的实效。所以这个口号不但在日本是人人耳熟能详,而且连后来的土耳其民族复兴运动也用上了。

平心而论,根据上面浅薄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脱亚只是脱掉日本表层的儒家文化,入欧却是穿上与日本经济基础相配的欧式外衣。进一步而言,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本来就与欧洲相类似,形式上的入欧极其便当,所以我们可以说日本人欧其实是虚的,实实在在的却是在于脱亚。而脱亚其实又只在脱离与中国、朝鲜表面相似的上层结构的特征,尤其是脱离中国思想意识的影响、政治制度的羁绊,来为日本完全接受欧洲政治思维与民主制度铺平道路。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当然这只是我学习日本史之后一己之思路。至于福泽谕吉在提出脱亚入欧思想时,是否有脱亚是实而入欧是虚这样的自我意识,恐怕还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对江户时期政治体制的学术研究是到了昭和时期才深化的,甚至就是“幕藩体制”这样的用语也是昭和初期才提出来的。一件历史事实在发生的时候,无论当局者或者旁观者都未必能对其实质有清醒的意识。只有在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之后,才更容易看清其来龙去脉而对之进行较为合理的解释。

[责任编辑 陈文彬]